



白水寺大门

李三科摄



白水寺 刘秀殿

李三科摄

奎星樓
邢振華攝



報恩寺

李三科

清真寺大门
李三科摄



清真寺大殿

李三科摄



震元大成學堂

李三科攝

目 录

抗战时期枣阳革命斗争回忆	高云晖 (1)
日寇三犯吴店及吴店人民的反抗斗争	张汉东 (12)
抗战时期共产党在枣北地区的活动	柳希荣 (16)
抗战时期的“熊集小学”	柳希荣 (24)
被捕前后	张同珍 (27)
枣北的“抗敌后援会”	黄诚恕 (39)
枣阳“硬社”的产生和发展	余 辉 (41)
枣北的“硬社”活动	黄诚恕 (45)
枣阳县参议会始末	丁 松 (49)
大革命时期枣阳的国民党组织	赵万爽 (53)
鞭撻军阀统治的几副对联	赵百岁 (57)
杀、杀、杀，杀尽反动派	靖炳扬 (60)
对联与鄂北地方革命史	詹华如 (63)
为宰十月记	马伯援 (66)
枣阳第一次解放	胡 波 (80)
刘邓大军解放枣阳	胡安立 (86)
三五九旅收复枣阳	马永谦 (93)
解放吉河的两次战斗	黄诚恕 (98)
歼匪记	余 辉 (100)
枣阳革命斗争史略	郭光珪 (103)
红九军在枣阳的革命活动二、三事	黄元庆 (111)
文家咀战斗的前后	谢远寿 张培德 (115)

马瑞堂回枣阳.....	赵万爽	(120)
九龙山主马瑞堂.....	时质田 张汉东	(127)
马伯援轶事		
——珍藏冯玉祥书赠对联.....	马永谦 詹华如	(131)
略谈白水寺.....	檀軹身	(133)
枣阳市区古迹多.....	杜超	(137)
奎星楼.....	胡安立	(145)
李馨远八旬抒怀.....	赵百岁	(147)
枣阳花鼓戏.....	陈书勤	(149)
王城的竞智学校.....	张达吾 王尊运 谢远寿	(153)
私塾生活的回忆.....	郭光璠	(155)
民国时期枣阳的货币流通.....	靖炳扬	(157)
建国前枣阳民间借贷及其主要形式.....	靖炳扬	(159)
解放前枣阳回民的生活及习俗.....	程相文	(163)
中医廖冠五先生的一生.....	施逢泰	(167)
解放前三办三停的回民小学.....	程相文	(171)
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		(173)
后记.....		(178)

抗战时期枣阳革命斗争回忆

高云晖

1938年秋，武汉沦陷后，我和陶维多（陶静）调回枣阳工作。到家一月，尚不能接上关系，心里很焦急。乃给在襄樊工作的易家驹（聂菊荪）同志写去了一封信。过了几天，有一位自县城来的青年到我家，他说他叫马千木，在枣阳工作，接到易家驹的信，知道我已回来，特来看我。因为没有正式介绍信，我就只说我是“民先”队员，从北平回来。他在介绍情况时说：现在已成立了“豫鄂边区”，地址在大洪山的长岗店，豫鄂边的抗战工作都由那里集中领导，要我到那里去联系。并说那里正在招收青年办训练班，叫我带些青年去受训。他在我家住了一夜，次日便走了。行前给我写了一封给陶俭寒（陶铸）同志的介绍信。后来才知道，马千木的真名叫马识途，当时是枣阳工委书记，负责整顿重建枣阳的党组织工作。

过了几天，我就动员一批男女青年，带到长岗店去了。在那里，见到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接上了关系，我也就留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时期。

“豫鄂边区”是我党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通过我党的统战工作，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同意才建立起来的，管辖湖北的枣阳、随县、安陆、京山、应城、汉川、钟祥、云梦、应山、天门、孝感十一个县及河南的信

阳、桐柏共十三个县。委派国民党第三行政专员石毓灵为总指挥，另外设立“政治指导部”，由李范一先生任政治指导部主任，李相符同志为副主任，范文澜等同志为委员。“政治指导部”的领导工作实际上被我党鄂中特委所掌握。同时，还在所辖各县委派一名政治指导员，枣阳的政治指导员是顾大椿同志。

1938年底，我以政治指导部中校视察员的身份，由长岗店回枣阳工作，并与顾大椿同志取得联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全国都处在抗日高潮时期，政治形势比较好。我们也抓住这个时机，搞好与驻防的川军四十五军的关系，并在这个部队中做了一些军运工作，因此，枣阳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较为顺利。我们发动群众——主要是青年参加抗日工作，利用“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歌咏队”、“宣传团”等多种形式，把他们吸引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

1939年春节前夕，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钱瑛同志经枣阳去大洪山，找豫鄂边区党委会商讨工作。当时，湖北省内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划归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沦陷区各县划归边区党委领导。枣阳虽未沦陷，但临近战区，为便于开展工作，也划归边区党委领导。春节过后不久，钱瑛同志转回，到达熊集，便在我家住下。我给她安排了警卫，准备好交通，她就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起来。经过几天的联络安排，于一天夜间在我家里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除我外，还有高定一（枣北人）、张宗厚（枣北人，当时任平林店第四区署国民党“自卫队”大队长）、王万尚（吴店人）、田玉书（平林人），好象还有耿集的章行之，但记不太准了，共有七八个人，开了整整一夜会。会上，钱大姐宣布成

立中共枣阳县委，张宗厚任县委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书记一职等顾大椿回来担任（顾赴边区未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钱大姐还说，枣阳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工作前途一定很好的。她又说我的社会关系很好，政治影响也很好，沿途都听群众在谈论，要好好保护，决定我以后只采取单线联系。会后，钱大姐要返回，我即派几名武装人员护送她到了襄樊。

此时，通过我党的统战工作，驻防襄枣一带的川军二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同意建立一支武装，叫“特种工作队”（简称特工队），到前线敌占区进行活动。我党决定利用这一合法名义，建立和扩大党的武装，就推荐郑岩平（郑绍文）同志担任特工队的总队长，由襄枣地方党组织动员大批党员和青年参加特工队。特工队成立后，在大洪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直到后来政治形势恶化被撤销，这支武装部队才正式编入我新四军第五师。

1939年春节后，国内形势逐步逆转，国民党推行反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鄂北的局势亦随之发生变化：第一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国民党的湖北省政府、省党部等，都在蒋介石面前告李宗仁的状，李受到很大压力，于是决定取消“豫鄂边区”，解散“政治指导部”。大约在三月间的一天，李范一先生从长岗店带了一大批同志到熊家集暂住，并派李相符、雍文涛等同志到襄樊去了解形势。过了几天，襄樊来信云：“李宗仁的态度还不坏，并欢迎他（指李范一）去。”我当即派些武装人员送李范一到襄樊。后来李范一又在茨河开办了一个“手工纺织训练班”，作为党的一个工作据点。我们也动员了一些男女青年到那里受训或工

作。随李范一从长岗店撤退时留下的干部夏菲、胡玄、郭纲瑜三位女同志，被安排在熊集小学任教，以掩护工作。

我和陶维多回枣阳不久，她就在熊集小学办起了一个妇女识字班，吸收了不少青年妇女。到了冬天，我们接管并改组了熊集的完全小学，由陶维多任校长，我们以学校作掩护，开展工作，并在学校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后来，我们又在吴家冲开办了一所小学，由吴少伯任校长，教员中莫平州、徐介之等均是我党地下党员，该校成了我党又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再后，又在小板桥建立了一所小学，调莫平州、董定才等同志和李锡九到那里任教，开展工作。熊集小学经不断地扩充提高，影响日益扩大，以致外镇如梁集、耿集的学生也纷纷前来就学，颇有声誉，曾先后受到当时国民党枣阳县第四区署（平林店）和枣阳县政府的通令嘉奖。因凡有路过的抗战军队，学校即派出宣传队进行宣传慰劳，送茶送水，多方帮助，鼓舞士气，所以有的军队将领还自动捐款，为学校提供经费。由于同志们的细心工作，地方群众的支持和上层统战工作的掩护，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熊集小学始终没有遭到破坏，党组织也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不仅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为我党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

“豫鄂边区政治指导部”被撤销后不久，原鄂北特委书记，当时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夏忠武同志来到枣南，在平林店天主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将枣北划出去，建立襄枣宜边县中心县委，并叫我任组织部长。散会时，他交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李范一，是李先念同志写给李范一的亲笔信，要求李给予援助。我即赶往樊城，会晤李范一先生。李

十分热情，慨然允诺捐赠军费3000元，棉衣500件，我便赶回复命。后来，原鄂中特委书记，当时任边区党委组织部长的杨学诚同志，从边区到达枣南，又成立了随枣地委，由顾大椿同志任书记（后来顾大椿调任天汉地委书记，由余益庵同志接替）。我地则成立了枣南县委，西边耿集及襄东一带则为襄枣宜县。我因采取单线联系，活动受限制，就专搞上层统战工作，掩护地下组织，积蓄力量，准备武装，以便迎接战局的变化，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上并调了贺明璧（贺依农）同我一起工作，任地下党的联络员，以便和地、县委联系。

1939年春夏之交，二十二集团军特工队总队长郑绍文同志带一批随员，去襄樊找李范一领取捐赠的经费和棉衣，路经我家，他告诉我，根据二十二集团军的情报，日军近日调动集结频繁，叫我早作准备。郑在我家住了一夜，次日到襄樊去了。又过了几天，在十三军军长张轸处工作的吴宪同志（解放后任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从随北青苔镇到我家找我，告诉我：第一战区汤恩伯已委派张轸军长为“豫鄂陕边区游击总司令”，现住青苔。吴宪也说战局形势日趋紧张，要我去青苔见见张轸，所成立武装的名称、武器都不成问题。我说我打算到南部山区查看一下地形，然后就去青苔。第二天，送走了吴宪，我就带了些人前往梁家山一带查看地形，下午我们刚登上山顶，就听到南方隐隐传来炮声。到太阳偏西，连机关枪声也能听到，第一次鄂北会战已经开始了。

我们立即下山，迅速赶到熊集镇，街上已是一片混乱，黑夜里溃散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到处乱窜，群众惊慌失措，都

来找我求计。我一面叫大家先撤到远离大路的偏远乡村，实行坚壁清野。一面迅速集合武装，编成部队，并将较大的学生集合起来，成立一支宣传队，由学校教师率领，深夜开到东边山村。天明时，日军大队已到达熊集。这次日军分别由吴店、熊集、耿集几路向枣阳、樊城进攻，国民党军队纷纷撤退。敌军所到之处，抢掠焚烧，奸污妇女，无恶不作。人民惶恐，思想混乱，有的老人说：“这回只怕亡了国！”有些青年则主张把房子都烧掉，大家到山里打游击，和日军拚了！我们在东山集结整顿，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多人。这时，二十二集团军特工队在大洪山赵新河被日军打散，其中一支约有三、四十人，由大队副谢坤同志率领，问道找到我们，参加我部行动。由于我们驻地与日军往来之处过近，距离不过两三里，所以我们派出去的警戒哨与日军发生遭遇的战斗时有发生。我们的战士多是些农民，毫无战争经验，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就决定在一天夜里，越过敌人的主要通道，乘其空隙，悄悄地把部队拉到西边青峰顶、梁家山一带的大山中去。部队一进山，精神大为舒展。特别是学生宣传队，情绪尤其高昂，一边在崎岖的山路上阔步行进，一边高唱着抗战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当时，方圆数十里内的人民群众都逃难到这座山中躲藏，人们慌乱迷惘，愁苦万状，见到了这样一支士气高昂的抗日武装，人心大为振奋，纷纷议论说：“中国不会亡，中国亡不了！”我们在两山住下之后，便联络附近一带的一些实力派，在梁家山开了一次会，决定自行组织一个“襄枣宜游击司令部”，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后来吴宪同志也从枣北带来信，说张轸

总司令部在战争中撤到三合店，在那里同国民党枣阳县县长王开化见过面，并委任王开化为豫鄂陕边区第四游击纵队司令，同时委派我为独立支队长，委任令由王开化转送给我。然而，日本侵略军占领枣阳，攻取襄阳，火烧樊城之后迅速地撤退了。我们不得不偃旗息鼓，设法将部队隐蔽起来，等待时机。至于“襄枣宜游击司令部”、“独立支队”两个旗号，也始终未打出来。连张珍的豫鄂陕边区游击总司令之职，不久也被撤销了。第一次鄂北会战，我们虽未能与敌寇直接交锋，但在国破家亡之时，却振奋了民心，干部战士也初步受到锻炼，取得了一些游击战争的经验。

第二次鄂北会战，从1940年5月开始。日寇集结重兵，向豫南南阳、鄂北的襄阳地带分数路大举进攻。南边一路日军，从钟祥北上，经宋集、李楼、沿梁家山外侧的大路，由王集、耿集一线直扑襄樊。同时分兵经熊集、吴店北上，攻取枣阳。日军来势凶猛，行动十分迅速。我们立即集合武装及青年学生编成队伍，连夜向梁家山转移，县委书记吕子平随我队一起行动，同时动员群众避难。有了去年的经验，我们事先就筹集了粮食、弹药，储存于梁家山可靠群众之处。进山后，我登上麒麟寨山顶，极目远望，只见天空敌机盘旋，系留气球悬挂高空，指挥炮兵作战。耳中只闻隆隆的炮声，连续不断的机枪声，目力所及，到处狼烟四起，火光熊熊，地面上日军的坦克、骑兵横冲直闯。我预感到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我们从袭击敌人时缴获的文件及军用品中，得知在这一路作战的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师团。日军为了攻取襄樊，在襄东一带展开了反复的激战，著名的爱国将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广西第一七三

师师长钟毅，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分别在宜城东北的南瓜店和襄东的黄龙垱阵亡的。我们驻守的山区，距主战场很近，山外大路上，经常有敌人来来去去，是敌军进攻襄阳的要道。我们利用地形的便利，时常派出游击小组下山袭击零散敌人，每次都有收获。我们还经常在夜间到敌军宿营地附近鸣枪，吓得敌人胡乱开枪放炮，彻夜不能安睡，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一次，我游击小组将一个骑马单走的敌军军官击毙，缴获战马一匹，手枪一支。敌人派兵到处寻找，找不到，就将附近村庄焚毁，以示报复。从敌人的行动看，被击毙的似乎是个重要军官。有一天黎明，战士们把我叫醒，说有一支军队要求见我。我出去一看，有一个四川口音的军人，自称是一二七师（属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五军）机枪连的上士，姓蒋，说他们前几天在乌金店一带作战被敌军打散了，便带领二十几名战士及两挺重机枪来投奔我，走了两个夜晚才回到这里，要求把他们收容下来。我看这个人态度诚挚，也很精干，心中猜想他可能是同志，否则不会冒这么大危险专门跑来找我。而且我们的武装装备很差，只有一挺轻机枪，正缺重机枪，便满口答应，欢迎他们一同作战。由于我们前天夜里袭扰了宿营于王家集的敌军，敌人一夜鸣枪不停，此时又调来大炮向各山头大肆盲目轰击。据事后了解，日军的炮弹只炸死了青峰顶山上难民的一头牛。由于日军反复派兵向山口一带搜索，我们只好整队转移。这时又增加了两挺重机枪，队伍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了，战士们威武雄壮，颇为振奋人心。其时西南各乡逃进梁家山的难民不下两万人，虽然在丛林中风餐露宿，生活十分困难，但都是团结互助，秩序井然，从来没有发生打架斗殴或偷盗抢劫事件，表

现出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的优良传统。一天夜里，我们在山上几个小村里宿营，半夜忽然人声嘈杂，经了解，原来是山下的村民逃上山来，说又到了大股日本人，是由襄阳方向来的，向东开去。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一面将部队拉进山上林间隐蔽，一面派侦察兵到山下打探情况。侦察兵回来说：“敌人已全部向东往王集方向开去，没有后卫部队。”蒋上士听后，建议去打敌人的尾巴，我也表示同意，便挑选精干战士随带轻重机枪，从麒麟寨山上向东搜索前进，到山口大冲处，就见古洞沟、冬青坡一带村庄中，有的敌人在做饭，有的在洗马，有的在田间活动，与我们相距不远。我们居高临下，立即开枪射击，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许多敌人应声倒下，未打死的有的逃进屋中，有的藏于麦田之内。蒋上士很有战斗经验，亲自操纵重机枪向麦田中点射，打得敌人滚爬躲避，迫使敌人暴露目标，然后加以扫射，又毙敌多人。已经到了王家集的大队敌军，闻声返回救援，在山口对面的山坡上架起机枪与我军对战，一时枪声密集，战斗颇为激烈。由于我军战士分散在高山草丛间，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所以这一仗日军伤亡很重，我军却无一人受伤，只有一个战士的长衫（我们有好多是穿便衣的农民）被射穿了一个洞，另一个战士的枪托被打了一个槽。敌军因我军有重机枪，以为是正规军，便调集炮兵，向我方袭击。新战士大都是不怕机枪却怕炮的，并且战斗已持续近两个钟头，我们的子弹几乎打光了，不能再持续下去，便下令撤退。敌军因久战不下，被困在村里的敌人又出不来，就派一支部队从山下沿大路向西迂回包抄我后方，恰好与我方派来支援的部队在八岔庙遭遇，我军立即开枪射击，敌人猝不及防，又被打死一些，我

队即迅速进入山林隐蔽，安全返回山林内休息。这天晚上，一位熊集逃难的老先生来宿营地看我，他诚挚地对我说：“以后你们要是打火（打仗），应先弄清情况再打。”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今天和你们打仗的有多少人？只怕有千把人。”我也很吃惊，问他如何知道。他说他进山时带的粮食吃光了，看看山外又没有什么动静，便一个人悄悄溜出山，想回去弄点麦子充饥，走到冲口麦田之间，突然枪声响了，子弹从头上飞来飞去，他吓得魂不附体，便趴到田沟里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战斗停止，敌军打扫战场撤走后，他才回到山上来。他说：“你要不信，可以去看看，黄土坡上敌人打的机枪弹壳一大堆，路边还埋着很多尸体。”第二天清早，我们分两路出山搜索查看，果然发现大路两边和一些村头，埋了许多新坟堆，有的坟头还插着一支柳枝，前面放着一碗清水。从八岔庙到王家集，沿途也发现不少，我们挖开一些坟，发现日军尸体都是用军毯裹着，而且都没有头。可能是敌军死伤过多，无力全运走，只好割下死者的脑袋运回国，而将尸体就地埋了。搜索了一天，没有大的收获。次日下午，高老五从宜城用毛驴给我们送来了一布袋子弹，解决了急需。通过这次战斗，敌人对这座大山颇有戒心，从此以后，他们到襄樊来往再也不走山下这条近便的大道，而是向北绕道熊集，再向西走耿集。这样，山区里的难民也都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次会战没有大的缴获，但在零星袭击中也得到了一些军用品。如我们用缴来的军用电池接上手电筒的灯泡，当电灯使用。有一次，我们一部分游击队员在癞肚山附近，发现一股敌人的运输队，便开火截击，山间的难民一齐呐喊助威，吓得敌人丢掉骡马逃命而去。这一

仗，我们缴获了十几匹骡马和运载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口很精致的皮箱，我撬开一看，是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便马上把它密藏起来。几个月后，把它送到边区。

第二次鄂北会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们当时估计敌人会占据襄樊不走，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与边区连成一片。可是出人预料，日寇重创国民党军后又撤回原地了。这时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战后的收缩、转变、善后工作也更加困难。此时，枣阳已为汤恩伯的势力所控制，他委派了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郭雪萍为枣阳县长。此人心狠手辣，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战后枣阳受到极大的破坏，县城被焚烧一光，全县疮痍满目，残破不堪。人民缺衣少食，无以为生。郭身为县长，根本不思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反而下令要各区乡人民得到的敌军物资，全部送到县里，他好当作战利品报功领赏。他还曾查问过我缴获的敌军电台，我说那是讹传失实，我们缴获的只是敌军电台用的电池，于是派人担了一挑子电池给他送去了事。随后，他又强令将全县的地方武装调集县城，说要编成“游击第五纵队，开到四望山（应山境内）去打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隐蔽精干，凑了一些人，带着破旧枪支，勉强开赴县城，在汽车站点编时，我们去的战士痛哭失声，我也泪流满面地与他们告别。后来，这些战士都陆续逃了回来，“游击第五纵队”也就慢慢地瓦解了。抗战时期，在敌占区工作，就是这么复杂、曲折和变化多端。

注：高云晖同志曾任湖北省文史馆馆长。此稿写于一九八一年。